

# 《四库全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考辨

——以《宋景濂未刻集提要》为例

何宗美

“四库总目学”研究的推进,不仅要在文献考证方面再作开掘,尤其必须对代表清朝官学思想的《总目》之观念体系加以审视和清理,由此取得新的突破。本文以《宋景濂未刻集提要》为个案,重点考辨版本与文献、明代文人别集流传与明代制度、明代文人佛、道题材写作及其传播等问题。通过考辨,暴露《总目》所存在的学术缺失以及四库馆臣在对待明人和明代文学评价问题的偏颇,从而显示明人别集提要考辨非同寻常的意义,并探究“四库总目学”研究新的途径和范式。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sup>①</sup>共有明人别集提要一千多条(含存目),为明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资料,是治明代文学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但受当时物质条件、信息手段等客观因素影响,特别是受到清王朝专制政治和民族政策的制约,《总目》明人别集提要在史迹、文献、版本等存在的一些问题,亟待澄清,代表官方思想的四库馆臣对明人和明代文学的臆测、偏见、误解甚至肆意歪曲更是异常突出。这就说明,对《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作一次全面的考证、辨析和清理工作,其意义非同寻常。《总目》明人别集提要的考辨与研究是“四库总目学”和明代文学研究的结合,因其条目甚夥,存在的问题非单篇论文所能解决,考辨工作十分繁复。本文选取《宋景濂未刻集提要》<sup>②</sup>为个案,以折射《总目》明人别集提要几个有代表性的突出问题,这包括:其一,版本与文献问题;其二,明代文人别集流传与明代制度问题;其三,明代文人佛、道题材写作及其传播问题。后一问题还涉及唐宋时期韩愈、苏轼、黄庭坚、杨杰、胡寅、真德秀等文学家和思想家相关问题的评价,这就使此则提要有了较宏大的文学史与思想史阐释空间。现拟将该提要作若干分解,并一一考辨如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研究”(批准号:11AZW006)、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人诗文批评及文学思想的考辨”(批准号:10YJA751025)阶段性成果

濂集重刻于嘉靖中,行世已久。此本乃国朝顺治乙未濂裔孙实颖得文徵明家所藏旧

稿,以示金坛蒋超,超择其中今本未载者,得三十八篇,编为此集,以补其遗。今以韩叔阳刻本重勘,其中《跋何道夫所著宣抚郑公墓铭》等十一篇,皆今本所已载,超盖检之未审。其余二十七篇则实属佚文。

(一)“濂集重刻于嘉靖中”的说法有误。宋濂集自元至正十六年首刻《潜溪集》后,入明后洪武至嘉靖间除《潜溪集》有重刻外,所刻者尚有洪武三年《潜溪新集》十卷、洪武十年《宋学士文粹》十卷、建文三年《潜溪续文粹》十卷、天顺元年《潜溪先生集》十八卷、天顺间《宋学士先生文集》二十六卷、正德九年《宋学士文集》七十五卷等等<sup>③</sup>。可见,嘉靖之前宋濂集是屡经刻行的,不能说到嘉靖才“重刻”。《总目》之说,易使人误以为嘉靖之前宋濂集的传播处于沉寂状态,事实则恰恰相反。在明代前中期,宋濂集一直倍受青睐,一再刊印,这是明代其他作家包括刘基都难与其相比的。情况直到隆、万时期才有变化,此后极少刊刻宋濂集,入清后到顺、康时期又出现了转机,包括收入《四库全书》的《宋景濂未刻集》即刻于康熙三年。宋濂集的刻行和传播情况反映了明清思想史和文学史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凡是宋濂集热烈盛传之时必为重道学之文的时代,反之则道学之文遭受冷落,如晚明性灵文学高涨时期就如此,故隆、万之后罕有刻行。以此而论,宋濂可以说是明清文学史及文学思想史演变的一面镜子。

(二)“文徵明家所藏”不是“旧稿”而是“元板宋集”。在版本学上“稿”是稿本之意,与刻本不可相混。文徵明所藏宋濂集是稿本还是刻本呢?此可本之于《总目》所据蒋超《宋文宪未刻集序》,该序明确说到“出文待诏家藏元板宋集一部”<sup>④</sup>,而不是“旧稿”。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四库全书》的《宋景濂未刻集提要》的说法也都是“原刻旧本”<sup>⑤</sup>,与蒋超所谓“元板宋集”恰相一致,《总目》殿本、浙本<sup>⑥</sup>皆误为“旧稿”,不足为据。

(三)“今本”已载者并非“十一篇”,“实属佚文”者并非“二十七篇”。今考,《未刻集》三十八文已收入《文宪集》即《宋学士全集》者为:《跋何道夫所著宣抚郑公墓铭》、《跋俞先辈所述富春子事实后》(卷一四)、《诗冢铭》(卷一五)、《故检校孔君权厝志》(卷二四)、《萝山杂言》(卷二七)、《拟答魏谯绝秦书》(题为《拟答吕相绝秦书》)、《大乙玄征记》、《书白衢州》、《秦士录》(卷二八)、《血书华严经赞》(卷三。题曰《华严经赞》),共为十篇,与“十一篇”之说不符。那么,“其余二十七篇,则实属佚文”就不确切,“佚文”之数应该是二十八篇而不是“二十七篇”。

(四)所谓“佚文”并非“佚文”,“未刻”亦非“未刻”。今见于《宋景濂未刻集》之文早在元至正间刻本《潜溪集》、《潜溪后集》皆被收入,刊行于世。其中《潜溪集》收入《国朝名臣序颂》等十六篇,《潜溪后集》收入《秦士录》等二十二篇,两者相加恰为三十八篇。两集皆未散佚,其中《潜溪集》在明洪武初有重刻,重刻本今藏于国家图书馆。《后集》初刻,据杨维禎序,不早于至正十七年<sup>⑦</sup>,此本今亦藏于国家图书馆。明嘉靖十五年,海陵徐嵩合前后集为《潜溪集》,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为目重编为八卷,刻本今亦存世。另据朱右序,明初尚有《潜溪大全集》,合《潜溪集》、《后集》、《续集》等为一编<sup>⑧</sup>。由此可见,《潜溪集》、《后集》在明代一直传世,两集本来就已收入,后被清初蒋超所编《宋文宪未刻集》称之为“未刻”之文三十八篇在明代自然也是传世的,根本不算什么“佚文”,只因蒋超版本见识有限,在当时仅见通行的明嘉靖刻本《宋学士全集》三十三卷,故从宋濂裔孙宋既庭处得文徵明家所藏宋濂文集元刻本时,发现“中间多目所未遇者”,便有所谓《未刻集》之编<sup>⑨</sup>。四库馆臣未加考证,沿用其名,并袭其说,便是其失于疏误之处。且提要中误“旧刻”为“旧稿”,或即馆臣据书名“未刻”臆断所致。

四库馆臣对宋濂集的版本情况缺乏整体了解,还可从《宋学士全集提要》得到佐证。《四库全书》收录《文宪集》三十二卷,到了《总目》中却变成了“《宋学士全集》三十六卷”,书目和卷数

皆不相同,提要中竟无丝毫说明,让人颇为不解。中华书局整理本《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作按语曰:“文渊阁库书作《文宪集》三十二卷,《总目》书名、卷数与之不符。”<sup>⑩</sup>整理者发现了问题,但未能指出症结所在,疑惑终未解决。其实,文渊阁<sup>⑪</sup>、文津阁《四库全书》<sup>⑫</sup>中的《文宪集提要》所载皆为“《文宪集》三十二卷”。那么,“三十六卷”又是怎样来的呢?是否有其依据?雷礼为韩叔阳所刻《宋学士全集》作序云:“先生旧有《朝京稿》、《凝道记》、《潜溪》、《翰苑》、《峦坡》、《芝园集》、《龙门子》、《浦阳人物记》,然各集出一时故旧以己见集者。今知浦江事韩叔阳萃为一编,共三十六卷,九百六十七篇,题曰《宋学士全集》梓行之。”<sup>⑬</sup>原来,韩刻本是宋濂《朝京稿》等集的合编,其中收入《龙门子凝道记》(雷礼误为《龙门子》、《凝道记》二书)、《浦阳人物记》,前者有三卷本和二卷本,后者为二卷本。《四库全书》在史部、子部已收入二书,所收《龙门子凝道记》恰为二卷本,这样,原本三十六卷的《宋学士全集》减去此两书的四卷就成了三十二卷。至此,《总目》与库书卷数不一的疑窦随即解开,中华书局整理本的注脚也有了真正的落实。

通过上述考辨,现将提要相关文字修正为:“濂集首刻于元季,入明屡有刻本,行世已久。此本,乃国朝顺治乙未濂裔孙实颖得文徵明家所藏元板旧本,以示金坛蒋超,超择其中‘目所未遇者’三十八篇,编为此集,以补其遗。今以韩叔阳刻本重勘,其中《跋何道夫所著宣抚郑公墓铭》等十篇,皆属已载,超盖检之未审。其余二十八篇,则未见于韩刻。”与原文对照,我们改动了六处文字,如此则庶几无误矣。

## 二

推究当日之意,盖或以元代功臣诸颂及志铭诸篇,大抵作于前朝,至明不免有所讳,或以尊崇二氏不免过当,嫌于耽溺异学而隐之。

此为四库馆臣的“推究”之论,其意有二:一谓《国朝名臣颂》等颂及《故检校孔君权厝志》等志铭“大抵作于前期,至明不免有所讳”,故未收入《文宪集》;二是《大乙玄征记》等文“以尊崇二氏,不免过当,嫌于溺异学而隐之”,故亦为《文宪集》所拒收。考究事实,这两种“推究”之意都不过是似是而非的说法而已。

先看其第一种推究。这种说法针对“元代功臣诸颂”来看或许不无道理,像《国朝名臣颂序》就有“我皇元受天明命,抚安方夏,天戈所指,万方毕从”<sup>⑭</sup>之类的话,到了明代显然已极不合时宜,不过,这却并不构成刊宋文者将其删削而不入其集的充分理由。因为我们从刘基《诚意伯文集》之《处州分元帅府同知副都元帅舒穆鲁公德政碑颂》(卷一〇)、王祎《王忠文集》之《端本堂颂》等亦皆“作于前朝”之作而被刊行来看,所谓“至明不免有所讳”的说法并无任何依据。特别是王祎文中诸如:“惟我有元,自太祖皇帝肇兴武功、聿成厥家,世祖皇帝诞敷文德、大造区宇,列圣相继,重基累构,益茂武烈,以纘天序。”<sup>⑮</sup>“真元烈烈,乘乾奋兴,皇基北巩,神旅南征,西域咸属,中原毕平。”<sup>⑯</sup>这一类文字,对元王朝歌功颂德、顶礼膜拜之态溢于言表,与宋濂《国朝名臣颂》如出一辙,这无疑对四库馆臣之说提出了最为有力的反证。

有关《未刻集》中“志铭诸篇”的情况亦如此。《四库全书》所采韩叔阳刻本《宋学士全集》收录《故翰林待制承务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柳先生行状》(卷二五)等文皆作于前元而在选刻之列。又,《元故嘉义大夫礼部尚书致仕赠资善大夫汪先生神道铭》(卷一七)等文,其写作时间虽在入明以后,但既然入明后为元旧臣作碑文尚无违碍,则入明前所撰此类文章收入集中亦属正常之理。再有,同时作于元末、其叙主同为吴直方的两篇文章《故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致仕吴

公行状》和《故集贤大学士荣禄大夫致仕吴公坟记》,前者收入《宋学士全集》,后者则未收,难道其一“至明不免有所讳”,另一则否乎?同时,《故检校孔君权厝志》既收入《宋学士全集》,又见于《未刻集》。这些事实都说明“有所讳”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再如《丛书集成初编》本《宋学士全集》,同治胡凤丹《序》说到“剞劂将竣,续获明本,较韩本文多至三百四篇”<sup>⑦</sup>,据《宋学士全集补遗目录》可知,“明本”中收有像《元武略将军荆王位下鹰房总管府副总管王府君墓志铭》等为元朝旧臣所撰铭作更是十分多见,所以,四库馆臣所谓“志铭诸篇”入明有所讳而不被收入的问题是不存在的。更有说服力的是从内容上看,以《蒋处士墓碣铭》为例<sup>⑧</sup>,这篇三百多字的短文所涉内容主要围绕“蒋君者,君子人也”展开,次则叙及自曾大父至其子男及女等。这种文字,放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定然不会有什么违碍之处。宋濂的其他文章也都如此。这应该是由宋濂的思想和文风的特点所决定的,四库馆臣称赞其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sup>⑨</sup>,概括的是体现宋濂思想特征的一贯文风,他的文章在封建时代是经得起时局变更的检验的,即使改朝换代也不至于“有所讳”,否则就不能叫做“自中节度”,宋濂也不能称之为宋濂了。以此而言,“至明不免有所讳”的情况或者会发生在元明之际其他作家身上,在宋濂身上则似无可能。

再看其第二种推究。此一说法涉及明代佛、道文化生态与文学创作及传播之关系,故不当小视。笔者考证,四库馆臣在提要中的有关说法同样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是:《未刻集》中的《大乙玄征记》、《血书华严经赞》所谓“尊崇二氏”之文,亦见于《文宪集》之内;二是《文宪集》中还有不少专涉佛、道的作品,如在卷四、卷七、卷八、卷一二、卷一四、卷一五、卷一六、卷一八、卷二六、卷二八、卷三〇。各卷中都收有此类文章,如《蒋山广荐佛会记》等等,总计不少于二十篇。再者,清人从“明本”中辑录的《宋学士全集补遗目录》,有关佛、道之文更是惊人之多,数量超过百篇。这充分说明在明代宋濂集刊行过程中并不存在“以尊崇二氏不免过当,嫌于耽溺异学而隐之”的现象,特别是韩叔阳刻《宋学士全集》已是思想日渐宽松、“异学”正值兴起的嘉靖中后期,上述情况更是不可能出现的。

### 三

观杨士奇《东里集》、倪谦《文僖集》并用杨杰《无为集》例,凡为二氏而作者皆别为卷帙,附缀末简,不散入各体之中。则正德、嘉靖以前士大夫之持论,可大略睹矣。

此说可谓似是而非、矛盾迭出之谈。首先,明杨士奇《东里集》、倪谦《文僖集》与宋杨杰《无为集》就佛、道诗文的编排体例并不相同。《东里文集》卷二五专收“方外”之作<sup>⑩</sup>,《倪文僖集》亦于卷三一收“方外”诗文<sup>⑪</sup>,《无为集》则不一样,据其编者赵士粲说是“删除芜类,取有补于教化者”编次成集,“若释、道二家诗文,则见诸《别集》”<sup>⑫</sup>。《东里集》、《文僖集》是别为一卷,并非另为《别集》。所以,不能说“并用杨杰《无为集》例”。

其次,对佛、道诗文的编排,宋濂《文宪集》、《未刻集》不仅与杨杰《无为集》、《别集》不同,与杨士奇《东里集》、倪谦《文僖集》也不一样。这里需要将历代文人别集对佛、道诗文的编排区分为三种情况:其一是别为一集,如杨杰之作;其二是别为一卷,如杨士奇、倪谦之作;其三是混杂不分,仅以文体为类,不以内容为别,如宋濂之作。其中,前一种情况因与正集流布异途,往往容易造成散佚,杨杰之《别集》不传即如此;后两种情况,则与整个文集同时流布,佛、道诗文丝毫不存在比其他作品更易散佚的概率。



再次,就是《无为集》本身也不像四库馆臣引述赵士絜所说的“若释、道二家诗文,则见诸《别集》”,这一点四库馆臣是有过考证的,并批评“未免自乱其例”<sup>②</sup>。这说明不仅四库馆臣的说法前后不无自相矛盾之处,就连其所引述的赵士絜所言亦未必株守。

那么,是否从杨士奇、倪谦诗文集的编排体例就可以得出“正德、嘉靖以前士大夫之持论,可大略睹矣”的结论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就以杨士奇《东里续集》来说,也与《东里集》体例不一。例如卷一五之《息庵禅师语录序》,卷二一之《圣教序》,卷四五之《息庵禅师像赞》,可见并非专有“方外”之例,而是散见诸体文中。与宋濂并称“一代之宗”<sup>③</sup>的刘基,其佛、道之作既未另入《别集》,也未专辟“方外”之卷,而是按文体编入相应的卷次中,如卷三《晚同方舟上人登狮子岩作》等,卷四《包与直题太一真人图》等,卷七《送柯上人远游诗序》等,不一而足。明初另一位作家徐一夔的《始丰稿》,有关佛教之文同样极为多见,编排上的做法也是“散入各体之中”。其后的情况也大多如此,以吴宽《家藏家》为例,诗如卷一《书句容丁溪僧舍壁》等,卷三《寄题阳山澄照寺》等,文如卷三一《重建觉山寺记》,卷三三《兴福寺记》等等。邵宝《容春堂集》的佛老之文,也是散入诸体之中而并不是“别为卷帙”。由此看来,杨士奇、倪谦诗文集对佛、道之作的编排方法不过是个别现象而已,不能视为“正德、嘉靖以前士大夫之持论”的通例,四库馆臣之说以偏概全,有想当然的成分。

#### 四

然古来操觚之士如韩愈之于高闲、文畅,持论终始谨严,固其正也。其余若苏、黄诸集不入学派者勿论,至于胡寅、真德秀皆讲学家所谓大儒,《致堂》、《西山》二集,此类正复不少。盖文章一道,随事立言,与训诂经义,排纂语录,其例小殊。宋儒尚不能拘,则濂作释老之文,又何必欲灭其迹欤!

这段话自“其余若苏、黄诸集”以下,《四库全书》原书提要有异文,曰:“至颜真卿书《多宝碑》,撰《麻姑坛记》,于平生大节,要亦无亏。历代文集,此类颇有,固未可以一端论也。观是集者,知其持论之失,但以文章取之可矣。”<sup>④</sup>两相对照,文字与语意殊有差异,其中《总目》的思想信息要比原书提要强得多,体现的官学特征更突出。

四库馆臣认为,涉及佛、道内容的写作,唐代以排佛著称的文学家韩愈“持论终始谨严”,堪为“古来操觚之士”的范型。提要举到韩愈《送高闲上人序》、《送浮屠文畅师序》两文,历来被正统论者视为文人之佛教文章的写作范本。其中,前序貌似论艺之文,实则由谈艺而论道才是其主旨所在。韩氏通过高闲与张旭草书的对比,说明决定艺术风格更内在的因素在于“心”境之不同,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故注定其艺术是缺乏内在生机的,其作品往往不过“善幻多技能”而徒具躯壳而已<sup>⑤</sup>。显然,韩愈是藉对佛家艺术的贬抑来达到对佛家人生态度和思想主张的否定的。后序是受柳宗元之请为僧文畅而作,主题集中于儒、佛之辨<sup>⑥</sup>,立意与其名作《原道》甚相同,故清初蔡世远收入《古文雅正》时称之为“小原道”<sup>⑦</sup>。韩愈上述两序不仅体现了儒者之文的纯正文风,尤其体现了他尊崇儒家、反对佛教的思想倾向,所以赢得了四库馆臣“持论终始谨严,固其正也”的好评。

基于这种观念,《提要》对本非纯儒的苏轼、黄庭坚佛道题材作品另眼相待,以为“不入学派者勿论”,实际上就把苏、黄与韩愈以及宋代理学家胡寅、真德秀区别开来而予以贬低。虽然,四库馆臣站在官学立场以对立的态度审视苏、黄的佛、道思想及其文学创作是有其理由

的,但如从思想史、文学史发展演进的客观事实来看,苏、黄融会三教,不守一隅,消解了儒、道、释之形下冲突,在更广邃的思想层面达到三教的形上会通,由此自塑了文人思想形态的新范式,也创造了文人文学艺术的新丰碑。这与此前韩愈的思想及其创作相比是极大的发展,与同处宋代的理学家相比也体现了根本的进步。在儒、道、释三家中,苏、黄大胆超越了儒家之域界,让其思想深深扎根于佛老之土壤,从而盘礴四达,放逸旁通。苏轼毫不讳言佛教精妙深邃,远胜于儒。《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sup>②</sup>和《黄州安国寺记》<sup>③</sup>说明,从儒者和儒学的立场来说,苏轼带着儒者和儒学的困惑与闭滞走进佛教的思想世界,在此他真正获得了思想的自由和精神的安顿。苏轼实乃一真佛者而非一真儒者,苏轼之学实乃真佛学而非真儒学。

四库馆臣有时也为苏轼作辩护,这又很容易使人对四库馆臣的佛教态度产生误解。例如《总目》为清初刁包《斯文正统》所撰提要中,以讲学与否来区分对待佛教的态度,貌似力为苏轼佛教之文作开脱<sup>④</sup>,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对佛教及苏轼佛教思想及其创作是充分肯定的。对此,我们唯有懂得馆臣编纂《四库全书总目》的思想总纲,才能真正把握其立论之基本倾向。《总目》在子部《儒家类·序》<sup>⑤</sup>就立场鲜明地阐述了如何看待儒家内外各学说之关系进而摆正其在思想学术史的应有地位的问题,这其实就是《总目》所遵循的思想纲领之一。在其思想体系中,“大旨以濂、洛、关、闽为宗”又是一个纲领的纲领,这实际上就把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排斥到正统之外了,所以在整部《总目》中我们不难发现批判蜀学的许多内容,如说“盖眉山之学本杂出于二氏故也”<sup>⑥</sup>,指斥苏辙“学圣不如学道”等说“未免驳杂”,尤其不满苏辙“晚年著述纯入佛老者”以致其学有欠“谨严”<sup>⑦</sup>。评晁说之《晁氏客语》时谓“其说或参杂儒禅,则自晁迥以来家学相传,其习尚如是,所与游之苏轼、黄庭坚等友朋所讲,其议论亦如是。此蜀党之学,所以迥异于洛党,亦毋庸执一格相绳”<sup>⑧</sup>。在给吕本中《童蒙训》所撰提要中又对比地指出:“本中北宋故家,及见元祐遗老,师友传授,具有渊源,故其所记多正论格言,大抵皆根本经训,务切实用,于立身从政之道深有所裨……以意推求,殆洛、蜀之党既分,传是书者轻词章而重道学,不欲以眉山绪论错杂其间,遂刊除其论文之语,定为此本欤?”<sup>⑨</sup>举例至此,我们无疑可以明白,为什么到了给明代宋濂《未刻集》撰提要时,仍不忘特别点出一句“其余若苏、黄诸集不入学派者勿论”的关键之语了。另外,在《东坡禅喜集提要》中还批评明末凌濛初专收“东坡谈禅之文”,认为《东坡禅喜集》“无裨艺苑”<sup>⑩</sup>。这又是有力的一个例证。总之,蜀学在宋学体系中因其兼摄佛老而被四库馆臣视为杂学而置于野狐外道了,虽未入禁毁之列,但遭受了边缘化的命运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对待宋儒与佛老的关系问题,《总目》暴露出看似包容、实则苛严而自相矛盾的态度。在《宋景濂未刻集提要》和《斯文正统提要》中,四库馆臣言及宋代大儒胡寅、真德秀文集中不免杂入佛老的现象,前者意在为明初宋濂集中出现同类现象释诬,以为像胡寅、真德秀等讲学大儒尚且如此,责备宋濂则有失公允;后者更是指责《斯文正统》的编者清初刁包,谓其对待苏轼佛教之文苛责过严。对胡寅、真德秀与佛老二氏之关系,《总目》还有多处涉及。《崇正辨提要》肯定了胡寅辟佛的思想立场,认为佛教为患的要害在于“以心性微妙之词汨乱圣贤之学问”,而不在“经典荒诞之说,支离矛盾”,因此又不满胡寅辟佛的做法不得要领<sup>⑪</sup>。这一点在为明代何思登《翼正录》所撰的提要也有论及,以为二书“得失相同”<sup>⑫</sup>。四库馆臣还注意到胡寅对待佛教的矛盾表现,即思想上“辟佛不遗余力”,但其文集中又有不少佛教题材之作,以为“未免自乱其例”<sup>⑬</sup>。这种态度在评价真德秀《西山文集》时再次阐明,批判“集中诸作,吹嘘释老之焰者,不一而足,有不止韩愈《罗池庙碑》为刘昫所讥,《与大颠诸书》为朱子所摭者”<sup>⑭</sup>。正因如此,故在为陈著《本堂集》所撰提要中仍不忘拿胡寅、真德秀“说事”,如说“且真德秀作《文章正宗》,

甄别最严,胡寅作《崇正辨》,攻驳尤力。而德秀《西山集》,寅《斐然集》,为二氏操觚者不一而足”云云<sup>⑫</sup>。

上述事实说明,四库馆臣对宋儒文集中杂以佛老二氏之作并不是听之任之,其重视程度引人瞩目,而且在对待方式上自有其思想策略,即评价上故作包容之态,实际上则一一点出,绝不含糊,表现出的形宽实严的特点。在问题(如“吹嘘释老之焰者”)得到如实揭示之同时,话语方式上则往往使用诸如“白璧微瑕,固不必持门户之见……亦不必竟以一眚掩也”<sup>⑬</sup>、“未可独为著咎”<sup>⑭</sup>来加以“轻描淡写”的技术性处理,这里边体现的绝不只是四库馆臣所谓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而是他们在对待宋儒问题上的矛盾心态。一方面,他们对宋儒思想杂以佛老意有不满,不留情面;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竭力捍卫宋儒的思想地位,在总体上维护其纯正圆满的思想形象,遵循所谓“以濂、洛、关、闽为宗”之大旨。这样,就形成了四库馆臣思想判断上的一个悖论,而之所以有此悖论又是为了适应官学思想之需要——无论在思想方面还是文学方面,宋儒皆被代表官学思想的四库馆臣视为正统之范式,也就是说宋儒在馆臣眼中既是思想的标尺,也是文学的标尺。从前文所举很多例子来看,这一标尺常常会被用来作为度量工具,其中本文所讨论的《宋景濂未刻集提要》就是最突出的一例。“宋儒尚不能拘,则濂作释老之文,又何必欲灭其迹欤”之说,其实就是拿宋儒之标尺来衡量明人宋濂,等于讲宋儒已有先例,“未可独为著咎”,宋濂“作释老之文”也没有什么出范之处,同样不可多加责难。但事实上宋濂的“释老之文”在明代并未有所谓“灭其迹”的遭遇,保存大量此类作品的《潜溪集》及《后集》在明代仍在重刻,明代刊行的大多宋濂集皆或多或少收录了佛、道题材的诗文,如《宋学士全集》三十三卷本、《宋学士文集》七十五卷本等。个别版本因整体上压缩收文数量而删削佛、道之文的情况也是有的,如天顺间黄誉所刻《宋学士先生文集》二十六卷。同对待宋儒一样,四库馆臣对待宋濂这种大儒和正统文人虽也指出“其持论之失”,但给予的批评是“点到为止”、“无伤颜面”,其做法说到底就是“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思想的贯彻。正因如此,《总目》的官学思想被大大强化,实学的态度则大打折扣,学术可信度也由此降低。

### 几点归纳

归纳言之,由《宋景濂未刻集提要》的个案暴露了《总目》存在的一些较为突出且具代表性的学术和思想问题,而其问题又事出有因,今略加揭橥且析之如下:

(一)版本见识有限,考辨有欠精审。编撰《总目》的四库馆臣虽以实学著称,但在叙及《四库全书》的版本问题上有时却疏漏百出。本文所举《宋学士全集》(《文宪集》)、《宋景濂未刻集》版本问题并非孤例,与之类似的情况尚有不少。例如《明太祖文集提要》<sup>⑮</sup>虽然花了很大笔墨来考证版本的来龙去脉,但其考证是在版本视野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做出的,所以许多具体问题未能真正落实。首先,《御制文集》二十卷的明初刻本、嘉靖八年唐胄刻本、《高皇帝御制文集》二十卷的嘉靖十四年刻本、万历谢正蒙熊尚文刻本、万历南京礼部刻本等<sup>⑯</sup>,以及《明史·艺文志》中提到的“《明太祖文集》五十卷”<sup>⑰</sup>,《总目》皆未提及,其中几种二十卷本今仍传世,四库馆臣在当时限于条件则无缘过眼。其次,《千顷堂书目》、《国史经籍志》著录的《太祖文集》三十卷虽被提及,但馆臣说“今未见传本,其存佚均未可知”,所以也未曾得见。所谓三十卷本,实乃明初刻本,题“御制文集甲集二卷乙集三卷丙集十四卷丁集十卷御制诗丙集一卷”,合计即为三十卷,在《千顷堂书目》中已注明<sup>⑱</sup>,此本今南京图书馆<sup>⑲</sup>、南开大学图书馆<sup>⑳</sup>分别有藏,说明并未失传,只是四库馆臣见识有限罢了。再者,《四库全书》收录的《太祖文集》二十卷本,四库馆



臣也没有弄清版本源流,以致措词曰“编次不知出谁手”、“未能详考其自来”,连“其刻在万历十四年”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今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明别集版本志》以及《全明文》朱元璋卷所据《高皇帝御制文集》来看,并无什么“万历十四年”刻本,而是万历十年刻本,要么是嘉靖十四年刻本,但那是徐九皋、王惟贤所刻,而非姚士观所刻,《总目》明确提到“目录之末有姚士观等跋语”则显然是万历十年刻本无疑。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因为当时的条件限制了四库馆臣的版本视野,馆臣们在撰写《总目》时不可能像我们今天一样有机会见到传世的各种版本。特别是《四库全书》修纂的版本来源主要靠官方征集,无论是各省采进还是私家进献,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征书行为虽然网罗颇丰,但仍然不可能竭泽而渔。据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谕内阁传令各督抚予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当时各省进书并不十分积极<sup>⑤</sup>,这种情况在进一步采取强制性措施之后虽然有了改变,但民间对于征书行为消极抵触和敷衍塞责的做法始终有所存在。加之,从官方初衷而言,对具体某书也未曾设想过对其各种版本全作采集。综合这些因素,四库馆臣在版本方面就只能是一种有限性视野了,从本文宋濂集和朱元璋集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这给我们的研究以重要启示,即在当下学术条件下《总目》版本研究还有待大大加强,其中也包括《总目》明人别集的版本研究。

(二)正统观念支配,立场不免偏颇。《总目》与一般文献学、目录学著作不同,是清代官学的产物。受官学性质的制约,全书被正统思想所笼罩,这样就决定了它不可能以开放、平等、公允的姿态来对待所评价的所有对象,也就是说它没有给所有被观照的对象以一视同仁的讨论平台,非正统思想的东西,往往受到来自带有正统思想眼光的四库馆臣的歧视和贬斥。因为,《总目》所构建的思想核心和观念体系必须紧紧围绕清王朝政治、思想统治之需要,起到巩固其专制统治、强化其专制思想的作用。例如,在对待包括儒、道、释在内的各派学说的态度上,该书尊崇儒家,反对佛、老,贬斥百家,针砭杂学,拮据异端。其思想宗旨在《凡例》中就反复得以申述,如“以阐圣学明王道者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谢彼虚谈,敦兹实学”,“辟其异说,黜彼空言”,“惟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拮据必严”<sup>⑥</sup>等等。四库馆臣限于官学思想和正统观念的束缚,不可能真实地面对、看待和评价思想史的各派学说,之所以如此,不仅由其自身的思想认识所决定,更主要是遵循最高统治的意旨而为之。比如,在佛、老问题上,乾隆皇帝的上谕中就明确表态说:“至儒书之外,阑入释典、道经,于古柱下史专掌藏书守先待后之义,尤为凿枘,不合朕意。”<sup>⑦</sup>所以,馆臣谈到整部《总目》的撰写时自云“圣裁独断,义愜理精,非馆臣所能仰赞一词者矣”<sup>⑧</sup>,实不为虚言。

《总目》总体思想的正统观,无疑深刻地影响到别集提要中的诗文批评及其文学思想,反映在本文所讨论的宋濂集提要即如此。在《总目》明人别集体系中,宋濂被置于朱元璋之后、刘基之前的位置上,体现了所谓“开国文臣之首”的地位。所以,宋濂集提要在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四库馆臣为明人诗文批评及文学思想确定的基调或纲领,性质非同一般。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关于宋濂集的两篇提要中,馆臣都十分热衷于对明代文学甚至文学史与思想史一些重要问题阐明立场,提出看法。《宋景濂未刻集提要》反映出对宋濂“作释老之文”的包容,体现了四库馆臣对大儒之文不求全责备的态度,本身就是其正统文学观的具体表现。《宋学士全集提要》<sup>⑨</sup>,则将官学支配下的正统思想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这一篇评价宋濂诗文的文字涉及的人物还有元之吴莱、柳贯、黄溍、闻人梦吉和明之刘基、方孝孺以及宋之欧阳修、苏轼等,他们都是著名的思想家或文学家,之所以出现在这则提要中,必有其深意所在。撰者先言元之文及吴、柳、黄、闻人诸家之学,意在说明宋濂之学及文皆有本源,不仅处于由元入明的历史转折之环节上,而且学为有“根柢”之学,文亦为有“根柢”之文,以此树立宋濂在明代文学史的开创



性地位。刘基则为宋濂之比较而出现,一是比较两人之文风,二是比较两人之优劣,其结论是濂胜于基:以文而言,“以德以力”,泾渭实分,即宋濂之文是道德之文,堪称完美,刘基之文是才力之文,“略有间矣”;以学而言,濂“讲贯五经”,为经学之学,基“讲经世之略”,类同于谋略之术,故“不及濂之醇”——于文于学,皆褒宋贬刘,其倾向和盘托出。《提要》中之所以提到方孝孺,则表明撰者的两个目的:其一是交代宋濂其学其文之传承和影响,其二是从另一角度再作比较,以方孝孺之“自命太高,意气太盛”反衬宋濂学养之“醇”与“粹”。方之传承而不能企及于宋,便暗示明代文学史在宋濂实为一座高峰和丰碑,几有“后无来者”之意。以欧、苏类比宋、方,是从师承和风格两个层面来显示宋濂与方孝孺之关系及区别,方之不及宋又暗含在对宋代文学的评价上体现出扬欧抑苏的观念。这样看来,在整篇提要中,宋濂便成了文学史脉络中纵横交织的一个网点,同时通过三个文学对比关系集中反映了文学思想的以下倾向性:在宋濂与刘基对比中扬宋抑刘,在宋濂与方孝孺对比中扬宋抑方,在相关联的欧阳修与苏轼对比中扬欧抑苏,即在纵面上打通了宋濂之文承接欧阳修之文的脉络,同时又在文学史大视野中确立了宋之欧阳修、明之宋濂的正宗地位。这种文学史观并不完全符合文学史的事实,即在当时也难成定论,放在今天来看更是违背文学真实面貌的偏颇之言。这种审美误读,同样是受了官学约束下的正统文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乾隆曾有谕旨云:“夫诗以温柔敦厚为教,孔子不删郑卫,所以示刺示戒也……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sup>⑤</sup>而宋濂“雍容浑穆”、“鱼鱼雅雅”之文,正是符合“温柔敦厚”审美要求和有利于封建王朝“世道人心”的最好范本。

(三)立论先入为主,谬误缘于臆测。此在《总目》明人别集提要中表现最突出,原因是清代是在推翻明朝统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权,其思想、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存在反明倾向。代表官方思想的《总目》在对待明代问题上戴上了有色眼镜,主观误读甚至恶意歪曲皆有所难免。乾隆皇帝和四库馆臣都有专门针对明代和明人的论断,且多以否定性或颇怀敌意的态度强调其词。如《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奉上谕》指出“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在销毁之列”,“明人所刻类书,其边塞、兵防等门,所有触碍字样,固不可存”,“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悖于义理者自当从改”<sup>⑥</sup>。四库馆臣也说:“今扫除畛域,一准至公,明以来诸派之中,各取其所长,而不回护其所短。盖有世道之防焉,不仅为文体计也。”<sup>⑦</sup>为此馆臣还制定了有别于其他历朝而特别针对明代的策略,《集部类序》云:“今于元代以前,凡论定诸编,多加甄录,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薙弥严。”<sup>⑧</sup>其实“删薙弥严”并不在于“篇章弥富”,真正的原因是乾隆皇帝所说的“抵触本朝”、有所“触碍”、“悖于义理”等,以及四库馆臣所说的“世道之防”。正因为如此,《总目》在评价明人及其著述时,总是带有“检查官”式的目光来审视,往往事先有了一个既定的观念作支配,其立论不免出现较强的主观臆测性。而且臆测通常依据的是清王朝本身的专制思想背景,是出自清人的历史语境来看待明人及其时代的。康熙间蒋超《宋文宪未刻集序》谓:“如撰元明郊庙诸乐章及伯颜铁木廉史诸公墓石……岂兵燹之余,此书散失,不则有所忌讳,不敢御木耶?”<sup>⑨</sup>蒋氏之论本为推测之语,并无考据,四库馆臣则据此无根之说做出了所谓“有所讳”的判断。由此看来,清人对于明代问题惯于作臆测之论,当为一个较有普遍性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总目》中还有不少例证,就其影响而论,又不免波及和扩大到对其他朝代文学文献的评价上<sup>⑩</sup>,所以《总目》明人别集提要及文学思想的考辨,其意义并不限于明代文学本身,对促进“四库总目学”研究的深入具有关键作用。

此外,编纂非出一人一时之手,提要文字歧出,不同观点杂糅不一,也是《总目》的突出问题所在。以明人别集提要为例,虽纪昀自云“余作《四库全书总目》,明代集部以练子宁至金川门卒龚诩八人列解缙、胡广诸人前”<sup>⑪</sup>,但据《四库提要分纂稿》,“明代集部”提要,翁方纲撰有

近二百三十篇(含未著录者五十多种),姚鼐、邵晋涵也撰有少量篇目<sup>⑤</sup>,说明提要原非出自纪氏一人。即使纪氏所撰,也有初稿与定稿之不同,例如在龚诌《野古集》提要后加的一段按语,《阅微草堂笔记》所载<sup>④</sup>与《总目》<sup>⑥</sup>就有很大差异,其中后者更符合清王朝官方意识。再从纪昀对吕留良“辟佛太过”的一段申论来看,“以尊朱之故”而“非其本志”似乎也反映了这位官学代言人在思想表达上有着两副脸孔<sup>⑦</sup>。加之,《总目》本身有一个成书过程,不同版本又存在差异,四库七阁的完成时间先后不一等等,这些都是导致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重要因素。

- ① 按《本文所据〈四库全书总目〉以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中华书局1997年版《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底本是殿本)为主,参以中华书局1965年版《四库全书总目》(底本是浙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提要》、《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等。
- ②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262—2263页,第2262页,第2262页,第2055页,第2056页,第2719页,第1193页,第459页,第459页,第1608页,第1208页,第2364页,第1244页,第1178页,第2114页,第2159页,第2181页,第2159页,第2181页,第2262页,第33—34页,第2页,第31页,第2262页,第10页,第5—6页,第1971页,第1981页,第2287页。
- ③④⑤ 崔建英辑订《明别集版本志》,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58—359页,第253—254页。
-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9页,第2494页,第2503页,第2529页,第2518页,第2529页。
- ③ 宋濂:《宋景濂未刻集》卷首“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4册第563页。《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集部下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23页。金毓黻辑《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版,第867页。
- ⑥ 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464页。
- ⑪ 宋濂:《文宪集》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3册第235页。
- ⑫ 《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集部下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22页。
- ⑬⑭⑮ 宋濂:《宋景濂未刻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4册第566页,第599—600页。
- ⑯⑰ 王祿:《王忠文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26册第317页,第319页。
- ⑱ 宋濂:《宋学士全集》卷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页。
- ⑳ 杨士奇:《东里文集》卷二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38册第290页。
- ㉑ 倪谦:《倪文信集》卷三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45册第584页。
- ㉒⑳ 《明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508页,第1635页。
- ㉓ 金毓黻辑《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第867页。《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集部下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624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提要亦同。
- ㉔㉕ 《韩愈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第209页。
- ㉖ 蔡世远编《古文雅正》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76册第143页。
- ㉗㉘ 《苏轼文集》卷一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90页,第391—392页。
- ㉙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卷二六《集部·明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23页,崔建英辑订《明别集版本志》,第254—255页。
- ㉚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41页。
- ㉛ 南开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南开大学图书馆馆藏线装书目录》,南开大学图书馆1989年自印本,第63页。
- ㉜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7—68页。
- ㉝ 参见拙作《明代文人结社现象批判之辨析》,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5期;何宗美、刘敬:《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明代文学思想辨析》,载《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9期。
- ㉞㉟㊱㊲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卷一八,《纪晓岚文集》第二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79页,第479页,第475—476页。
- ㊳ 翁方纲等:《四库提要分纂稿》,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单位 西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山木